

# 主题·儿童心理·审美观

——近年儿童电影小议

汪 天 云

电影艺术对于广大观众的思想影响远远超过其它艺术，儿童电影尤其如此。社会主义中国的孩子，都曾在银幕或电视屏幕前找到了他们的知音。孩子们是多么需要电影呀！他们如饥似渴地盼待着；同时，他们又以特定的儿童语言“声明”：反对雷同，反对司空见惯的琐事堆砌！下面，想谈谈三点肤浅的看法。

第一点，关于儿童电影的题材和主题。毫无疑问，儿童们对电影题材是有自己的选择要求的。遗憾的是，某些编剧、导演往往忽略了这一点。尽管他们也认为，儿童电影作为当今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领域，是毋庸置疑的。可他们仍不明白也不承认电影艺术的源泉乃是社会生活，反而以为人们的思想，尤其是儿童们的思想情感，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受电影支配，是电影艺术的产物，所以概念化、图解、说教、雷同之作，屡见不鲜；其中人物要么肤浅苍白、枯燥无味；要么好为人师、脱离实际，难怪小观众们有意见了。

能责怪孩子们不懂艺术吗？当然不能。列宁说过，苏维埃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责任，“仅仅让工农群众看马戏是不够的，要引导他们懂得欣赏交响乐。”同样，我们的儿童文学的作家、编剧和导演，必须意识到面临的一个重大职责——不断开拓儿童们喜爱的题材，提高孩子们对电影的鉴赏能力——这实质上是提高民族未来的智力和审美水平的需要。

应当指出，儿童电影的最公正最有力的评论者乃是儿童，问题的关键不仅仅在于亿万小观众能否正确地鉴赏电影，而且还在于他们的鉴赏和评论能力，是足以决定今后的儿童电影本身的命运的。因为艺术的生命和群众的鉴赏是辩证地互为作用的，这是文化艺术留在其发展史上一条带共性的定律：艺术提高了群众的趣味，而提高了的群众趣味又反过来要求并促使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回顾近年来的儿童电影状况，正说明了这一点。

众所周知，我国的儿童电影起步较晚，解放前只有一部儿童故事片——《三毛流浪记》。六十年代是儿童电影的繁荣期，但十年浩劫又使之扫荡殆尽。三中全会的浩荡东风，使枯枝重萌新蕾，党和国家对儿童电影十分重视，一九八〇年中国第一家儿童电影制片厂在北京应运而生，全国各大故事片厂也把儿童电影列入了议事日程。从作为献给国际儿童节的影片《啊，摇篮》开始，一批儿童电影相继诞生：《苗苗》、《小海》、《四个小伙伴》、《赛虎》、《鹿鸣翠谷》、《闪光的彩球》、《绿色钱包》、《大虎》、《泉水叮咚》、《红象》、《应声阿哥》、《将军扶我上战马》、《小刺猬奏鸣曲》等等。

应该承认，在短短的五年中，我国的儿童电影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和整个文艺潮流一样，正向新的深度与广度迈进，这是应当肯定的。但仔细研究一下近年问世的作品，便会发觉它们瑕瑜互见，步子谨然，题材近似，突破甚少。就题材而言，近二十部电影，无非可分三

大类:

1. 描写儿童的转变:或由落后而先进,或由自私而团结,《小海》、《绿色钱包》、《宝贝》、《大虎》等均属此类。

2. 写做好人好事:(包括大人做好事——关心孩子)如《四个小伙伴》、《泉水叮咚》、《闪光的彩球》等等。

3. 光荣传统教育:《鹿鸣翠谷》、《赛虎》、《将军扶我上战马》等片可谓代表(还有《白龙马》、《没有字的信》、《苏小三》等等)。

诚然,上述题材很重要,但和当代儿童的整个生活相比,显得落落寡合,色调单一了些。值得庆幸的是,开拓者不乏其人。《飞来的仙鹤》、《应声阿哥》、《小刺猬奏鸣曲》、《红象》给观众留下了耳目一新的感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北京电影学院三个年轻人导演的儿童片《红象》,在题材突破方面腾出了可喜的一步。

《红象》勇敢地走出了家庭,走出了城市,也走出了孩子们司空见惯的生活小圈子,让三个可爱的傣族儿童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之中。神秘的山谷,美妙的榕树林,湍急的瀑布,奇异的鸟鸣;还有马鹿、豹子、蟒蛇、象群,这一切引人入胜的景物,象无数瑰丽的珍宝,由一条扣人心弦的金线——“勇敢探索”紧紧串连。让小观众们身临其境,伴随影片中的三位小主人公游历一次充满着知识、惊险、魅力、乐趣、友谊和希望的大森林,必然会激起孩子们极大的兴趣和联想。

题材的新颖当然也有利于主题不落窠臼。

《红象》的可贵之处,就是对以往儿童片“主题单一”的传统观念有所突破。一部新颖有趣的儿童故事片的主题完全可以更丰富、更广阔些,对不少作品生硬地将剧中的一切思想和情节均归结到一个目标的作法,实行了否决。他们的大胆尝试不无根据。著名的儿童教育家孙敬修曾经说过:“电影应该象一个神奇的百宝箱,每个孩子打开它,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男孩子能找到男孩子喜欢的,女孩子也能找到女孩子喜欢的。”显然,孙敬修这里所指的出自“百宝箱中的东西”,不仅仅是电影的情节,也包括影片的思想主题。孩子们是坦然而然的,他们并不根据主题意义的重大与否而决定重视不重视,接受不接受,而只是自然而然地记取强烈吸引自己的那些“东西”。事实上,这些“东西”比贴上强烈色彩的说教性的单一主题,更富有生命力和教育意义。和新中国同龄的青年一代,每每回忆起自己的孩提时代,自然而然地会记起《马兰花》、《风筝》、《白雪公主》、《汤姆·莎耶尔历险记》、《铁木尔和他的队伍》。这些作品的主题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概括,但它们深深地留在我们金色的童年里,并在我们今天乃至以后的岁月中起着作用。影片中那些充满活力的真善美的形象,陶冶了我们儿时的性情,把爱的种子埋入了我们的心田。《红象》的主题正是向着长远而广阔的方面开掘的。影片通过三个学龄初期的红领巾的一次“探险”活动——寻找代表着希望和力量的红象,表现了孩子与大自然、孩子与动物、孩子与孩子之间纯真、炽烈、深厚的情感,也充分展示了儿童们勇敢、善良而美好的心灵。《红象》的主题是颇为丰富的。

当然,儿童影片还是以具有积极教育意义主题为第一需要的。从艺术创作规律来看,好的作品不该带有作者的主观人为痕迹,而是让观众从人物性格冲突、情节的发展中去领会其中的丰富主题和深刻教益。在这方面,《飞来的仙鹤》获得了成功。影片通过小主人公贺翔在动荡年月的不幸遭遇和以后传奇般的经历,在人物性格冲突中刻划了养父养母的崇高善良,善的主题高高崛起,催人泪下,从一个孩子悲喜交加,再度选择的复杂情感中,观众领悟到

了值得珍惜的一切。

马克思说过：儿童的天真总使人欢悦。每一个时代的固有特殊性在儿童的天性中得到“纯真的复活”，而对人们发生永久的魅力。而人们又总是应该在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这是个艺术的哲学、艺术的辩证法。《飞来的仙鹤》正是依照这一规律跨上了成功之路。影片通过一个孩子的遭遇，充分反映了我们所处时代的固有特性：拨乱反正后，贺凤翥夫妇得知自己收养的小翔，是舞蹈演员白鹭的唯一后裔后，为了使他们亲骨肉得以团聚，使小翔能在一个更优越，更有利于智力发展的环境中成才，纯朴的养鹤人不惜千里迢迢把他们夫妇用心血养大的儿子，送还给小翔的生身父母。美好的心灵，使主题闪耀出隽永难忘的光辉。主题仍在深化——因为编导站在更高的艺术阶梯上：白鹭盼子成龙心切，极力想把小翔培养成音乐家。可小翔有自己的情趣和爱好，他去探望动物园的好朋友——仙鹤，嫩江的山水陶冶了他，赋予他生命和感情的土地在召唤他，他还是回到了对他有养育之恩的仙鹤的故乡。

《红象》和《飞来的仙鹤》的主题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是可取的。它们使我们的儿童电影产生了新的飞跃。

第二点，关于儿童电影与儿童心理。

对儿童心理的研究，近年来在我国教育界正在形成较好的风气，但是在文学艺术界关心这一课题的人却很少。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于兰同志，对此就深有感触，不研究儿童心理就出不了好的儿童片，所以对担任儿童影导演的同志们多次强调：“在拍摄中，对剧本与镜头的各种增删改动一定要重视儿童观众的心理。”

既然是儿童片，那么出现在银幕上的一切应该是小观众们所感兴趣的。他们无法接受节奏缓慢，线条复杂，人物众多，故事冗长的作品，更不喜欢听了一遍又一遍的枯燥乏味的说教，而喜欢不断变化的具体事物。儿童片《大虎》和《小刺猬奏鸣曲》所以取得截然不同的效果，恐怕不能单从主题上题材上去分析（两者都是积极的），原因在于前者反映的内容小观众觉得平淡无奇、司空见惯，而后者把矛盾放在三个不同肤色、不同国籍、不同性格的孩子中展开，出现的小动物不是小猫、小狗、小马、小羊（这些小动物实在是儿童影坛上的“老”演员了！），而是一只逗人的小刺猬。这一点足以抓住儿童们的心理，外国小朋友是怎么玩耍、说话和生活的？农村的孩子想看，小刺猬是怎么长大的，怎么会失而复得的？城里的儿童也饶有兴味。儿童观众和成人观众的最大区别，恐怕就在于儿童去看一部电影时主要的是感受，而不象大人那样去做理性的分析。因此，影片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和强烈的动作性则成为儿童片至关重要的特征了。与此同时，儿童心理上更容易接受轻松、明朗、快乐、有趣的信息，过于深奥、详尽的心理分析只会使小观众们感到茫然。正如别林斯基指出的那样：“儿童不需要辩证的结论和逻辑一贯性的证明，他们需要形象、色彩和声音。”波兰的著名影评家罗曼·伏兹尼亚·考夫斯基对当前的少年儿童电影也有过这样的讲法：“电影院对青年人和儿童有着特殊的吸引力……但是儿童影片本身却始终得不到最低限度的科学性研究，在这方面的理论工作是做得甚少的。成年人跟儿童在心理方面区别如此之大，所以艺术创作的形式也必须有所不同，遗憾的是世界各国为儿童拍摄的电影作品在形式的处理上还是非常任意的。”这里，伏兹尼亚·考夫斯基向广大儿童电影（电视）编导提出了一个值得共同注意的问题，即注重儿童心理特点，使影片不仅在题材上，而且在艺术样式上（形式上）也必须有所不同。这个观点很有启迪作用。因为，儿童片的关键，并不在于影片的主人公是孩子还是成

人，而在于如何适合儿童心理。简言之，也就是如何来“讲”这个故事。儿童片的全部特殊性就在于它的表现方法上的特殊。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化大力气去研究。

如果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话，那么，七十年代末出现的苏联儿童幽默杂志片《叶拉拉什》是可以借以比较的。

十分钟的儿童幽默杂志片《叶拉拉什》，其词意(ЕРАЛАШ)是“愉快的错中错”。它为儿童们提供了多样化风格的广阔天地，其中有喜剧，也有正剧、侦察片、歌舞剧和游艺节目片。它往往只有八、九分钟，甚至更短些。但是它以生动形象的画面培养儿童尊敬别人的品德。它告诉孩子们：你们也要长大，成为大人。它也同样吸引成人，因为它常常提醒他们：要有容忍的态度，您不是从儿童时期过来的吗？《叶拉拉什》之所以经常参加国际电影节，并荣获最佳儿童幽默片奖，是因为其编导了解当代儿童的心理共性，找到了正确的基调（这同教训、示喻儿童应该怎样去做是两回事）。孩子们之所以喜欢《叶拉拉什》，是因为它十分体察和理解儿童们的心思。它懂得批评是一件微妙的事情，孩子是个娇嫩的对象，表扬孩子一定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声音还得响亮，批评他们的缺点，可就要单独进行，免得伤害他们的自尊心，他们还是刚刚开始生活。举个例子，小故事片《桔子》仅仅描写两个孩子吃桔子，准确地说是一个吃，一个在旁边看；摄影机让小观众和第二个孩子站在一起，注视着第一个孩子怎样剥掉厚厚的桔皮，又怎样把一片片多汁的大桔瓣送进嘴里。小观众很快就会同情没分到桔瓣的伙伴，而对那个独食者产生了愤怒。就在这时第二个孩子说了句挺高尚动人的话：“我要有桔子的话，一定会分半个给你吃。”看来故事到此可以结束了，不，情节还在发展。那个贪婪的孩子对身边的小伙伴瞅了一眼耸耸肩膀说：“是的，很遗憾，可你现在没有桔子呀！”这个带有悲剧成分的小故事引起了一阵哄笑，笑声冲刷了可爱的第二个男孩的某种屈辱，也谴责了第一个独食的小男孩的贪婪行为；当笑声消逝时，大多数儿童心里都在寻找自己昔日的影子——到底是象第一个孩子呢，还是象第二个孩子？

《叶拉拉什》是值得参考和借鉴的。对儿童心理研究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一部儿童片的效果如何，而会影响到一批儿童片的质量起落。

第三点，关于儿童审美观的问题，刘厚明同志曾把儿童文学功能精辟地概括为八个字：导思、益智、添趣、染情。笔者完全赞同。不过，我觉得还可以补充两个字，即——审美。德国古典哲学中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曾经说过：人有审美的感觉，审美的理智，才能感觉到外面的美。显然，他所指的审美的感觉是指五官正常的一切人，包括儿童。一个人从婴儿开始，当他的眼、耳、鼻、舌等器官与自然界接触的瞬间起，他的审美功能也产生了。“美”与“丑”往往是孩子们脑海中最早出现的概念。

我们常常可以听到儿童们最简单最初步的审美语言：某种东西（也包括电影）好看，或不好看。他们还很幼稚单纯，缺乏社会生活的经验，但却有自己最朴素的（也可以说是人的本能的）最敏锐和最公允的（儿童没有任何社会偏见）审美观。他们的审美感与成人不一样。因此，要求我们的儿童电影经得起儿童审美感的检验。

那么，儿童审美观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这似乎很难用几句话来概括。在此，想起了朱光潜先生引用克罗齐的话：“美，就是成功的表现。”是的，对儿童们来说，他们纯洁的心灵就象一张毫无瑕疵的白纸，成功的光辉投下的任何色彩是美的，善占了主要比例。但又不尽然，除了善以外还应该真。真与善构成了孩子们心中的美感，这两者的矛盾产生了震撼童心的喜剧和悲剧。

先举《红象》为例吧，影片在故事发展的始终比较忠实地运用了儿童的审美观来处理一切细节，不失实，不做作；密林、猛兽，沼泽、误解、分裂、劳累，“真”的出现是实实在在的艰难险阻；勇敢、信念、理解、团结、不顾牺牲自己去救护别人，“善”的面目更是楚楚动人；最后三个小伙伴终于找到了红象，骑着大象，披着霞光凯旋而归，美的感觉达到了高潮，这是孩子们发自内心的喜悦。由此产生了喜剧美。

同样，悲剧性的情节也使儿童心中产生美感。《飞来的仙鹤》中就大胆运用了这点。小翔从小与大草甸中鹤群为友，他曾冒着狂风暴雨，在草原上录下了各种鸟鸣，其中包括他最喜欢的小鹤寻找母鹤的叫声，这是“善”的代表。然而，小翔的生母白鹭不理解孩子的感情，粗暴地把这段录音全部擦掉了。冷酷的现实使小翔十分伤心，他流着眼泪夺门而出，“善”暂时被“真”压倒。但小观众们的心里却仍产生了一种悲剧的美感，他们会觉得含着泪在夜幕中奔跑的小翔是美的，因为他们同情弱者，同情善的代表，产生了共鸣，流下了感动的泪。他们期待的是与小翔一起奔向养育了小翔的大草原，奔向美丽的鹤群，奔向慈祥可敬的养鹤人——贺凤翥夫妇……。电影在小翔奔入大草甸后千情万意迸发的时刻结束了，但隽永耐味，那种带有悲喜交加的感情久久地留在小观众的心里，它产生的美感不仅是画面上的一层，更强烈的是震撼儿童心弦的那层层波光。

以前，有人总以为给儿童的作品，总该是明亮、优美、和谐的，是轻风、皎月、花影之类的，其实不然。事实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儿童的审美观也在发展提高。这和我们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不断发展有关。最近上映的外国儿童片《典子》、《情暖童心》、《父子深情》、《泥之河》，还有《女孩和马》、《弃子》等片，很大比例不是喜剧，不是以大团圆为结尾的，而是告诉儿童们，在世界上存在着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一切成功是来之不易的，要敢于与不幸的命运去抗争。联想到全国正在开展的向张海迪学习的运动，要让孩子们真正懂得五讲四美，光有正面的“善”是不够的，还得把“真”的内容反映出来。张海迪之所以万难不屈，奋发向上，与她童年的经历，与她一贯的对“美”的追求是分不开的。那么，我们的儿童电影是否也应该在审美这个意义上，引导孩子们向新的高度迈进一步呢？应该的。

如果说，美的要素的搭配（包括知觉、感觉、情感、理解、意图等等）是一道深奥的难题，那么，这道难题也存在于儿童电影之中。如果我们的编导能从力求解出（或接近）该题答案的高度去对待自己的作品，那么，美的艺术生命一定会在其中显示出来的。

在本文结束的时候，笔者想引用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著名作家、评论家和美学家莱辛的一段名言。这位十八世纪的文艺大师在《汉堡剧评》中写道：

“帝王和英雄的名字能够使一部剧本显得壮丽和威风；却不能使它因此而更感动人。那些处境和我们最相近的人，其不幸必然能深刻地打入我们的灵魂深处。如果说，我们同情国王，那是因为我们把他们作为人看待，而不是因为他们是国王的关系。他们的地位固然常常使他们的不幸显得重要些，但都不能使剧本因此而引起更多的兴趣。虽然整个民族往往会被牵涉到不幸中去，但我们的同情需要一个个别的对象，一个国家对我们的感性认识说来是一个过于抽象的概念”。

这段话说的很正确，成人文学尚且如此，儿童的作品则更值得注意了。